

美国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 中国传统孝慈文化当今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美国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篇一

一、弓|言

“孝”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并且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内涵。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目前有关于“孝”的起源和内涵是孝文化研究探讨所涉及的最基本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如何使传统“孝”思想现代化、以及如何解决当前学术研究的视角相对较单一这一问题，学界经常性的忽视了有关“孝”哲学这一重要的角度；“孝”是“仁”之本，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孔子的“仁”，可目前却是探讨“仁”的多，而研究“孝”的少。

我们不能忽略早期学者所作的贡献。国外的学者们例如郝大维、罗思文对孔子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主要介绍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翻译《论语》《孝经》等著作。由于当时语言上直译的条件匮乏，导致了西方人经常用西方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后来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思想同化。这些学者们在对“仁”“孝”“忠”的思想上进行了全方面的注释，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本选题将在吸收前人先辈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亲亲相隐”的视角来

解读《论语》中的孝道思想。

二、孝文化产生的渊源

这里所讲的就是把基于天道本源的男女作为社会最初始建的一种现实起点，男男女女组建成的家庭以繁衍后代的这一家国建构为要求，客观上要求基于这种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维系这种伦理的“孝道”，任何的生命个体，都是来源于父母的精血汇集而成。自然界当中生命个体的孕育成长，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呵护哺育，自然界的动物尚且有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我们作为人子，自然也会产生出这种原始“孝”的观念。从“孝”观念的起源来看，其最本来的含义就是“对于生命的延续”。由此逻辑发展而出的祭祀祖先的行为和敬老意识。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了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还应当包含繁衍后代、以及尊祖敬老等行为。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的中国社会当中，“孝”是人伦关系得以创建延续的基础，只有懂得了孝，才能够使得家庭和睦，使得社会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孝”是人对人伦的一种深入的认识，要构建一个好的人伦关系体系，需要一种正直、真心、虔诚、尽心的品质，这种品质最基本的实现形式就是“孝”。只有遵循了人性中最本能、出于本心的道——孝道，个人意识到“孝”是人的本性，通过修身达到对孝的一种认同、践行和传承，这个过程是“成己”的，即先使自己成为一种为社会道德伦理所遵循的样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再推而广之才能使别人得到益处，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孝与仁，孝与忠，在孔子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在道德实践当中共生的。孝悌是仁的根基。《论语》当中就讲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

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为人孝悌，也就做到了仁，这是一以贯之的。而“孝”与“忠”，自然就可以做到推而广之。“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从事父母可以推广至事君主，孔子在这里就将“孝”扩展提升到了社会、政治层面，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从孔子的表达中不难看出。孔子最终注重的还是民德之厚，而非单纯的政治教化，所以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为人之本，“孝”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末，“孝”作为血亲伦理的基本元素，对家庭和社会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讲的就是这种血缘亲情所产生的“孝”。“孝”是家庭关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孝”是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原则，孝亲观念乃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一脉。

“孝”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之一。要认识孔子的孝道思想，就要先了解孝，“孝”并非只是对父母进行物质生活上的奉养，即孔子所要求的“能养”，这只是“孝”应该具有的本义，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孔子认为“孝”的产生是必须以人类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作为基础。《论语》一书中，从“老”与“子”的家庭观念关系角度出发来阐述“孝”的两个基础。其一，就是从人类的自然血缘亲情出发，“老”产生“子”；其二，就是从社会等级的差别上出发“老”与“子”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子”就应当守礼，对“老”敬孝。《论语》就是从这种人类最原始的自然亲情血缘关系出发，来确定“孝”产生的基础。

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践行孝敬的思路

在《论语》的记载当中,子谈论“孝”,有两个大的突破性观念是过去所没有的。在西周时期“孝”这一观念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因此,它带有极其浓重的宗教色彩,在当时分封制的社会大环境大背景下,“孝”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族道德,而“孝”所蕴含的人伦意义,或者是“孝”作为家庭道德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突出。而孔子论孝,则实现了“孝”由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转换,“孝”主要是用来规范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关系,其过去尊祖敬宗的涵义尽管没有被“孝”完全的替代,但是分量也已经微乎其微了。

孔子所讲的“孝”,无论是讲“不远游”也好,知“父母之年”也好,其目的都是在于为了施孝,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为人子女要在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更多的是要表达对父母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敬爱之情。孔子对于“孝”的重视,当中也贯穿着仁的精神理念,他将“孝”与“敬”、“孝”与“礼”相互关联在一起,这极大的丰富了孝的内涵,这是过去的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

孔子认为,作为子女,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去尊敬父母,对父母行使孝心也是要求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敬重、奉养父母。“爱亲”与“敬亲”是相互的,“爱亲”可以从“敬亲”中表现出来,“敬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爱亲”的行为。孔子认为如果仅仅是在物质上才父母进行赡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孝亲的最基本要求便是要养亲、事亲。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所讲的“孝”其实就是无违于礼、所讲的“仁”就是爱亲爱人、我们要能够做到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重、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心的侍奉、做到不让父母挂念自己的安危、这就是孝的表现。孔子不遗余力地弘扬“孝”文化,孔子的一生,验证了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过程。三岁丧父,由其母亲带回家养大,生活的十分贫困,地位也极其的卑微,孔子的青少年时代极其的平凡和普通。然而,孔子却立志求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间接的影响了其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像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大思想家们都非常崇拜孔子的思想，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理性、和平、以及人道的象征。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曾经引用过孔子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现在同样也被刻在了联合国的大厦里面。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已经不单单只是属于中国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国籍和国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天、天道、天德为思想背景，将“孝”提升到了人文关怀的高度，身体力行的推广“孝”。孔子的“孝”思想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忠”为内在的情感表达，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和内在的“忠恕之道”，最终达至“仁”的境界，实现“孝”的皈依。孝道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了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孔子因袭周礼，虽然继承了西周时期敬祖祭祖、慎终追远的净胜，但是对于“孝”思想含义当中这些观念涵义的表述则是尽力的淡化，更多的是在于强调“孝”在伦理思想上所蕴含的意义。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孝道内容以及表现形式，是紧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而不断的演变着的。“孝”观念最早形成是在以血缘亲情作为基础的父系氏族社会。血缘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血统，它是人类因为生育后代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血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组成体系的基础，而人既然知道血缘，那么就一定知道血缘至亲，也就会产生后来的报答生养之恩的观念，这种起源于自然的血缘亲情之爱，这便是最初孝的意识。孔子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孝悌爱亲是一种人之常情，如果处于每个血缘关系中的人都能够珍视这种感情，那么社会上的人自然就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处于这一温温脉络亲情关系之中的人，也会将这一温情扩散开来，温暖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美国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篇二

摘要：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借鉴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孝慈文化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孝慈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本文就对传统的孝慈文化以及当今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一探讨研究。

关键词：传统孝慈；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

“孝”和“慈”作为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慈精神。然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就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诚实守信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传统孝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保存了原始社会中的众多因素.而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百善孝为先“孝”和“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统道德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都逐步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孝慈精神。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这说明公元前11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孝的概念。被后世推崇的尧舜禹三代圣君中的舜即以孝著称,一旦尊亲与尊过发生矛盾,孝道与国法发生矛盾,孟子坚持维护的原则,他主张抬高尊亲而不是尊国,抬高孝道而不是国法。孝为立身之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不强调孝,社会肯定乱套。中国古代选拔领导干部,称之为“举孝廉”[3]。这样就为孝道与忠道结合起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2. 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 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亦纷纷而至, 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个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 能够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们思想盆地形成发展的规律[7]。

2.1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哲学意蕴:

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求真、旨归善和创造美上。“探求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探求真, 具体表现为: 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 构建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 形成对现实、对生活、对学科的开放体系, 保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知识源泉, 促进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真的探求, 以使学科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必须合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创造美”。历史活动中的“美”, 同时也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即“真”的’达到和对于历史合理性即“善”的实现; 既研究建构学科的结构与内容之真, 又研究创造人们的精神家园之美等等。对学科研究进行审美思考, 超越单纯的真与善的层面, 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担社会责任的更高境界。

2.2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人文意蕴

社会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的责任是承担社会政治责任, 即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创新与发展, 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规范, 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着意于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 解决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 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实践, 积极过道德生活, 加速人的道德社会化, 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再生产。

3. 传统孝慈对当今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良价值导向的挑战，以及“信仰危机”，诚信，尊重等问题的考验，人们思想道德教育则成为他们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路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3.1 孝慈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现阶段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潮之中，“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更加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信。因此，孝慈是做人的基础，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孝慈立足于个人如何应对人我关系和群己关系，它表现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整体主义的心理体悟，“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本体性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本体性。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3.2 孝慈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效益经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

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唯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里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现今社会也是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慈孝文化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慈孝文化是人际和谐的范导,引导并调节人际关系走向友善、平等、诚信、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可以由慈孝文化推而广之,都属于大慈孝的范畴。

4. 总结

传统孝慈文化不仅蕴涵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执著的理念,而且还有助于唤醒人们的伦理自觉,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并且有益于遏制道德衰退和生态破坏。它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儒学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孝慈文化不仅是德的根本与起点,也是教化的根本与起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是人情陶冶、道德升华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全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注意培养公民的孝道,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美国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篇三

任何一项政策的变迁都不是随意进行的,在其变迁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制约力量。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不是单一动力作用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政府、大学生三个方面的分力融合而生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个动力系统中,根本动力是社会环境,基础动力是政府,直接动力是大学生。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作为一个子系统,其“外围”有一个更大的系统,即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

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产生制约作用。

(一)经济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主导因素。政策作为人们“思想”的产物,自然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自建国以来,我国形成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集中管理,高校被定位于政治之中。围绕政府意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只规定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旋律等意识形态教育。如1950年《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高校设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后,直至1976年的政策始终强调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社会主旋律教育的规定来看,1950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方针、组织与方法的几项原则》规定了“反帝教育、土改教育、五爱教育”的工作重点。1961年《高教六十条》提出,要使大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高校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而拥有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群体表现出“拥紧现实而放逐理想,追逐功利而嬉戏道义,尊重自我而淡薄群体”的价值取向[2]。对此,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教育内容的时代,开始重视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要。1986年《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要普及法律常识。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校园文化”的教育途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推进网络化教育的开展。

(二) 政治体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体制上容纳的可能性决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3]因此,对政策变迁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政治体制。建国初期,我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映在政策领域即以中央精神和领导指示作为逻辑起点。如1950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强调,“根据共同纲领文教政策”来规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及其他方面。1970年《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指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强调,遵照胡启立同志关于“在全国各大学开设法律基础课”的指示开设法律基础课。

随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进程的到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仍存在集权政治的“阴影”,但已不是“主流”。如《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規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强调,根据十五大精神进行课程设置及有关工作。20《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政策导向的变化,即开始关注大学生的道德、心理和生活需要,政策的文本表述由“引导”代替“应当”、“必须”。在制定政策时,政府也逐渐跳出“权力的圈子”,积极迎合学校、教师、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历时9个月的调研,涉及全国几乎所有高校,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宏观管理、教材建设等几个方面[4]。

(三) 文化价值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

文化的因子总会深入制度的具体规定和内在精神,成为决定政策变迁的重要变量。改革开放前,社会文化价值观高度同质,人们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和权威的意志作为价值尺度,绝对否

定人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社会的一切事务由政府直接决定,民众(包括大学生)无权利质疑政策或拒绝执行政策,即使政策发生方向性错误仍得到运行,进而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错再错”。如1957年《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出台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左”,教育目标转向阶级斗争教育,教育内容转向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教育方式转向劳动改造,管理体制转向工农兵学员管理。1980年《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才逐渐“转轨”。

改革开放后,文化价值观多元突显,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价值观“迷失与缺失、多元与偏离”[5]等现象,使政府主动地变革政策。如《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教育内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增加了适合大学生个性需要的教育途径。在教育管理方面,1987年《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提出“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制度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障。”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因此,在政府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众多活动中,教育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维护、加强其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大学生作为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行为个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状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管理不是我国政府独有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方式对高校德育进行管理,只是管理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际发展来看,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全面干预,以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是基础动力。

政府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过程中,由官方主体(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中宣部、团中央等)主动提出,并在各高校选择有经验的思想教育教师进行旧、新政策的讨论,最终以官方主体的名义发文。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胡锦涛同志专门就大学生思想教育作了3次重要批示,要求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做出部署,接下来由教育部组织力量对全国10个地区,包括北京地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上海地区、天津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等多所高校进行调研,征集大量材料,并从地方高校选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专家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最后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形成的。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形成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了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大学生利益却无法真正得到体现,这种政策是“义务型”政策,即一项政策出台后,目标群体不得不履行一些新的义务或者增加履行原有义务的总量。由政府主导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渐进变迁为主,少有激进变迁。从政策变迁的60余年来看,除《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_”时期对政策作全面调整外,基本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变迁。政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时,不是保持“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而是以一定的价值取向为基础。政府的价值取向表现在:(1)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2)统一大学生思想和行为;(3)培养社会的接班人。

政府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主导力量,主要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变化调整和终止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新的政策。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来看,建国之初政府全面学习前苏联,使政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的规定上明显带有前苏联教育制度

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不满和躁动倾向,为此政府推动政策转向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并相应增加了“阶级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等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受“_”的影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讨论,为此政府主动结束了阶级斗争教育,并推动政策从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向突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教育。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受“市场化”、“利益化”、“功利化”倾向的影响,大学生队伍出现了“理想淡化”、“信仰动摇”、“价值扭曲”、“责任感缺乏”、“心理素质欠佳”等倾向,为此政府再次调整政策,提出“校园文化建设”、“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教育形式,提出建立德育工作的评估制度,制定有关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价条例及实施办法。同时,制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费投入制度,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指标。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大学生

政策总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群体。一项政策如果使目标群体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它就较容易被目标群体接受;反之,一项政策如果被目标群体视为对其利益的侵害和剥夺,那么它就难以得到目标群体的认可[7]。因此,大学生作为目标群体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

50年代大学生对政治、马列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据回忆:当时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大家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8]。因此,不论政策怎样学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它,学生的表现促使政府沿着建国初期的政策走下去。从课程规定来看,1956年《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与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相比较,除增加马列主义基础外,其余保持一致。1957年后,部分大学生思想的波动状态才促使政府进行政策微调。如1958年《对高等学

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一律停开政治课,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1959后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60年代大学生共同拥有着“讲政治,不讲出身”的时代心理,对党、国家和毛主席表现出无限忠诚,拥有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追求。学生的表现使政策在延续的基础上向绝对服从于政府和社会的方向发展,以至于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如1961年《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4年《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其目的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80年代大学生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搜寻”、“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自我超越”,逐渐散去了对政治理论课的热情,认为“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9]同时,少数学生中也出现了某些思想消极、混乱等现象,并多次发生**。学生的变化使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增设思想品德、法制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育内容。

90年代大学生思想动荡比较明显,如面对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感到迷茫和困惑,面对“脑体倒挂”现象和新的就业制度心理问题急剧增加。学生的变化使政府积极进行政策调整。如1995年、1998年分别形成“两课”改革的“95”、“98”方案。从课程改革来看,浓厚的政治色彩降低,道德教育得到提升。同时,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以“德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并整体规划学校的德育体系。这表明政府努力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生活化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独生子女、网络信息良莠混杂、人才双向选择、“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环境的出现,使大学生群

体的问题愈加增多。有调查显示,“考试焦虑、不善于人际交往、就业焦虑、社交恐惧、梦境解析、网络成瘾、个人情感问题和强迫症八大问题”是困扰大学生的普遍问题[10]。学生的变化使政府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中央领导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着手对政策进行调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 and 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教育途径、队伍建设、组织保证等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管理方式进行了调整。

美国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篇四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属于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儒家伦理型文化,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包涵着许多优秀的思想道德成果. 本文从具有时代意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入手,提出加强道德教育是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与和谐社会相同活力的内容,同时也是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可以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 继承儒家文化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使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塑造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作者: 于秋波吕翠微付亚樵作者单位: 于秋波,吕翠微(佳木斯大学思想品德教研部,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付亚樵(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刊名: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

名□journalofsoc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年,

卷(期): 27(5)分类号□g641关键词: 和谐社会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美国和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篇五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建设的基本理念郭晓伟来源：
《光明日报》（04月06日07版）

高等院校作为宣传、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阵地，要在教学内容上充分体现核心价值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重要途径，将核心价值融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推动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化、大众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义不容辞的任务。

坚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社会主义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明确体现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目标指向性和价值取向性，即鲜明的方向性。我国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项教学内容中的主导地位，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使其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实现的。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二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通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他们在学习和生活实践中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核心价值的要求，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既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把握上，更建立在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取

得了辉煌成就，但在新阶段将会面对更深刻、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的科学发展。因此，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科学性的关键。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科学性，就必须以“四个坚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点：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只有提升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为大学生所乐意接受，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系统性。内容的系统性是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它本身具有严密的科学体系。在贯彻、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应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在教学内容的构成上，是由各方面内容组成的整体，既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这样的主导性教育，也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这样的基础性教育；既包括“应然”的教育内容，又包括“实然”的教育内容。其二，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在教学内容的配合上，具有整体协调的性质。遵循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由浅入深、由外到内、主次清晰、重点突出、整体协调。通过多方面的分工和配合，使大学生由点到面、由面到体，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塑造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在教学阶段上，要充分考虑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遵循思想品德发展规律，既有对普通学生的基础性要求，也有对先进分子高层次的要求；既有对低年级学生的要求，也有对高年级学生的要求。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时分层次、有重点、循序渐进，充分调动各部分学生的积极性，使各层次的学生都有进步。

突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的时代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但要反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要反映时代使命、

精神、目标、任务和途径。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需要注入生动鲜活的内容, 与时俱进, 生生不息,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首先, 要及时增加党的指导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灵魂, 将科学发展观与具体情况相结合,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次, 要拓展、创新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例如, 需要大量吸收关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方面的新鲜内容。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